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三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九七期 ——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7a）

【难忘岁月】中国知青在缅甸	佚名
【五洲震荡】从跨国革命到跨国犯罪	刘晓波
【凄美青春】关于知青生活的回忆	李四
【悲哀年代】我记忆中的知青	程美信
【甘苦人生】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章德宁·岳建一
【童年旧事】洪荒年代记事	力刀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四）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难忘岁月】

中国知青在缅甸

• 佚名 •

前一段，京城一出话剧《切·格瓦拉》的上演引起了颇多争议，我由此想起了我所知道的当年老三届“支援世界革命”的往事。

红卫兵跑到越南去的事儿网上已经有所披露，有人怀疑其真实性，我证实确有此事，因为我一位表弟（当时在北京四中）就是游过红河到了越南，被越南军人抓往后遣送回来的红卫兵中的一员。

中国人自发跑到国外去打仗，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当数中国知青参加缅共之事。我虽然知之不多，还是将所知点滴写出来上网，抛砖引玉，引出那些曾经历过这一段的知青们来回忆一下，也让那些个写《切·格瓦拉》，赞颂切·格瓦拉的“左派”文人们看看，这“红色革命”是用无数天真青年的鲜血染成的。是功是过，让人民来评说。

一九六九年底，适逢云南省瑞丽县大量知青集中在水库工地之时，“要打仗了！”一条惊人的消息在工地传开了，知青与缅共的故事由此引发。

在此之前，边疆地区一直在搞林彪的“政治边防”，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很紧。

知青下来后，被告之对面是所谓“缅反区”，是“苏修”准备向我们进犯之基地，还有一块地区是“蒋残匪区”，是当年国民党李弥残部占了近二十年的地段。因而要特别警惕。全体知青自然都成了民兵骨干，也无须来“抓壮丁”。曾经发过一支破“三八式”步枪给我，枪口已经磨损的可以将子弹倒装进去，比起武斗时我玩过的那些枪差到天边去了。有一次夜里对面两边打了一小仗，一颗炮弹落到中国境内，炸伤一个老人和一头牛，政府组织所有民兵沿着边境线游行示威了一天。距我所在寨子不远的江边一个寨子，有几个知青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订了几份报纸。有个老头天天来买他们的旧报纸，他们也没在意。不料有一天，县里来了一大批军人，把这个寨子的知青全数抓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里通外国，把报纸买给了敌特。这几个知青后来命运如何，无人知晓。

到过瑞丽的人如果留心一点看地图，会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直沿江走的国境线，在瑞丽县中部忽然拐个弯，跨过江来，划走了有如片竹叶形的一块地给缅甸，大约有十多平方公里吧，据说这是周恩来当年的一个高招。我简要描述一九六九年之时的形势：缅甸政府当时是亲苏的，中国为了搞定缅甸，想办法策反了缅甸佤邦、掸邦地方民族武装的首领，在瑞丽边境那块缅方飞地成立了以中国人为主要领导的缅共东北军区（对内称农场），我见过其军区政委，是个四川人，家里人都还在四川，四十年代当了解放军，打李弥军时到了边疆，不知怎么就变成了缅共东北军区政委了。当时缅甸共产党中央根据地已经被缅政府军打得弹尽粮绝，形势极为不利，而其东北军区在中国的大力支持下，装备极为优良，解放军还没配备的仿造美制M16的新型“八号”步枪就已经给了缅共。为了支援缅共中央根据地，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某著名将军领导的编号为八〇八团的参谋团，制定了一个打通中国边境到缅共中央根据地的运输通道的军事作战方案，第一仗就是打下畹町镇对面的缅方据点，时间正好是知青们修水库之时。

大战打响那天，上千名知青跑到畹町。畹町的地势是两边都是山，缅共由中国边境山脚向那边山头进攻，在这边山上坐满了知青和当地百姓们观战，那边山上却不见人影，不知那些穿统裙的缅兵躲在哪儿。知青们大多经历过武斗，又看过不少战争影片或书籍，人人指手划脚，说应当如何打、如何攻，大有拿破仑再世之豪气。

开战之前，只见中国边境这边，黑压压聚集了近万名缅共军队，在他们身后，中国军人身着便服，以中国民兵的身份给他们压住阵脚。再往后，沿边境线的公路上，一字儿摆着数十门火炮，炮口直指对方山头营房。突然之间，一曲响亮的进行曲由高音喇叭中传来，是那首著名的军歌。随后，一男一女开始高呼口号，听着跟文革中两派打仗时差不多。“坚决支持缅共人民军的革命行动！打倒缅甸反动派！”等等。

喊上一阵之后，喇叭声停了，双方阵地出现片刻静寂，随后，大炮轰鸣声让所有人捂住了耳朵，大地震得就象山要塌了似的。转眼间，对面的营房、工事就看不见了，全部被浓烟给盖住了。炮轰持续了十多分钟，又忽然停住了。没多会儿，枪声就响了起来，只见缅共第一批人沿着山脚排成一条横线在向上爬，后面间隔着十多米又有一排，共有三个梯队在上进攻。观战的知青当中，不知何时跑出两位别的县的知青来，从他们口中传出了令所有人吃惊的消息：在对面山上进攻的队伍中，第二梯队全部是由中国知青组成的知青营！暂且先不管这消息的真伪，这一下子所有观战的知青们的心态全都变了，原来只是看个热闹，现在是全都担上了心，大家不再吵闹，几乎是屏住了呼吸地关注着战事。

此时，枪声并不激烈，缅共向上前进似乎挺顺利，已经接近对方的阵地，没看见有人倒下。对方阵地的硝烟也散了，仍然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正猜测，是不是缅兵头天晚上就溜了，一阵爆豆似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只见攻方的人全都趴了下去，也不知道伤了人没有。双方一阵对射之后，攻方第一梯队的人一阵呐喊，冲了上去，被一道竹栅栏给挡住了，又卧倒在地。又一阵对射，几个人跳起来，想去推那竹栅栏。这儿观战的知青们急得大叫：笨蛋，去送死吗？不会用手榴弹炸呀。

话儿还没落音，只见那边就已倒下几人，其余人又只好趴下不动了。僵持了一会儿之后，只见后面一排有几人猫着腰往上窜，快接近栅栏时又趴下了，随后几声爆炸，硝烟过后，缅共已经冲进了对方营房。据事后介绍，在后排的是由景颇族组成的部队，勇而无谋。后排的知青上去了几人，用手榴弹炸倒了竹栅栏，压住了对方的火力，众人一起冲锋，得以攻破敌方防线。此后没多会儿，枪声骤停，对方阵地上扬起一面白旗。众知青们一阵欢呼，潮水般向对面山上涌去，那些边防军也不阻拦，让我们通过过境小桥。

上去之后，尸体没见几个，俘虏到见了一大群，大批缅共正忙着收缴战利品，一问起来，大部份都会说汉语，有边疆少数民族，也有内五县的汉族，而且还真有一伙知青在其中，数量还真不少，组成了整整一个营。他们当中居然还有跟我同校的，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看守俘虏的娘子军，那个腰中别着小枪的指挥官，就是我校高一的。文革中她是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儿，在中学生中算得上小有名气的人物，现在你看她那神气劲，真可以用毛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来形容了。不消多说，知青们此时会怎么想，在受到罐头、饼乾、洋烟等战利品招待之后，知青们也知道了当缅共的途径。当即留下的就有十多人，其余还留有点凡俗之心的人（包括我在内）则回工地收拾东西，准备过几天来参加光荣的“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因为消息走漏，我最终被我哥拦下来，失去了献身“世界革命”、当中国格瓦拉的机会。而其他知青们，则去了无数，我不少朋友都跑出去了，瑞丽县水库为此差点停工。除瑞丽知青外，盈江、梁河、陇川、腾冲、保山等县都有知青跑了出去，还有大批到农场的四川、北京、上海的知青也过去了，估计当时至少也有几千人，组成个师都没问题。此事立即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急忙下达指示，让缅共停止招收知青当兵，这股当“格瓦拉”的热才被止住了。但仍有大批知青没回来，他们参加了第二年的那场攻打腊戍之战，有的就永远回不来了。

话说缅共小试牛刀，胜了畹町一役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得到大批年青力壮、有文化、还有点儿战争经验的知青生力军，真是高兴得要命，立即开始实施第二次重大战役方案。这第二战，按中国参谋团的战略，缅共不是去打那唾手可得的紧邻瑞丽弄岛的缅甸第三大城南坎，而是出奇不意地奔袭其第二大城腊戍。那里有直通海边的铁路线，占住那里后，通往缅共中央根据地的通道就可以算是打通了一大半了。

大军出发了，匆匆组建的知青营作为先头部队，沿着密林丛布的山沟，向异国内地开进。一路上行进的极为顺利，只碰到极少数的地方武装，刚一开火敌方就已作鸟兽散了。据情报说，敌军的精锐部队被我方战术所迷惑，正朝着南坎方向开进。中缅边境的几大民族武装，已经被招安了，而盘踞在缅甸境内的蒋残匪，则躲入深山，坐观虎斗。因而缅共东北军一路顺风地挺进，于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兵临腊戍城下。

下面是我一个朋友的回忆：

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们连最先登上距腊戍城两公里的山头，部队停下来，观察城里动静。从山上看下去，城里灯火通明，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看不出有什么防备。众人不由喜出

望外，都认为此战胜算在握了。指挥官一声令下，我们打头向城边的火车站冲了过去。到了车站外，没见到一个带枪的人，只有些老百姓站在街边看热闹，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扑进了车站。进了站，但见两列极漂亮的火车停在站台上，候车室里有不少人在等车，一个当兵的都没有。几个哥们冲进站长家里，把站长从被窝里抓了来。当官的通过翻译审站长时，我看有个老兄脸红得不正常，便问他怎么了，他忸怩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他们抓站长时，刚踢开门，便见那家伙正跟老婆干那事，几个兄弟都没见过没穿衣服的女人，当即臊得退出门外，背对门站着等那家伙出来。好在那站长胆小，先把枪给扔了出来，人才跟着出来。要是那人敢开枪，说不定他就没命了。我们这儿正说着呢，就听见那站长直叫唤，大伙看他手指着对面山上，也就朝对面山上看去，车站里的人也都跑了出来，都在看对面山上。我定睛一看，跟我们来的方向相反的山上，一条灯龙正沿着山腰蜿蜒而下，龙头已经快到山脚了，龙尾还在山后，看那阵势，少说也有几百辆汽车。坏了，是敌人的大部队赶到了。我还没回过神来，传令兵跑来了，指挥官下令让大家往来的方向撤退，临走又命我们班留下，将火车头炸了再走。

我们班就我一人会用火箭筒，也只有我在训练时打过一发弹，此任务当然地落在我头上。我上了榴弹后，趴在一条路基上，瞄了半天，看着那两辆据说是日本人送给缅甸的光彩照人的内燃机车头，心里暗自可惜，最后一咬牙，闭着眼睛扣了扳机，一声巨响过后，碎片四处飞溅，等我睁开眼，一辆车头已经燃起熊熊大火。

我正准备装第二发弹，突然听到我身后有一阵“噗哧、噗哧”的声响，回头一看，那个刚跟我说过站长之事的哥们，脖子上插着一尺多长的一块有机玻璃片，倒在我身后，脖子上的血一阵阵直往外喷，我当即吐了一地。等卫生员和班长把他抬走后，我把剩下那辆车又炸了。我一人往车站外跑的时候，只见候车室外一大群人默不作声地看着我，那个衣冠不整的站长则抱着头蹲在地下，很悲伤的样子。

等我赶上队伍时，没见到他们抬着那个受伤的哥们，班长黑着脸，不回答我的问话，卫生员告诉我，那哥们死了，遗体被放进了一个铁路涵洞里。我回头看看，只见那灯龙已经穿城而出，朝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的人早就跑到山那边去了，原先的先头部队变成了垫后的，我这个班是最后面的。有什么可说的，跑吧。跑了几天后，被一伙民团打了个埋伏，死了好几个兄弟，我屁股上也挨了一枪，被班长和几个弟兄轮着背回根据地来。到根据地时，我自己都感觉到半拉屁股上那些蛆虫的蠕动。之后部队就把我送到昆明四十三医院治伤，医生告诉我，要是没那些蛆，我早就被感染致死了。

下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

我们刚翻过山顶见到腊戍城，就接到后撤的命令，一开始还很有秩序，后来就乱了套。当官的都不见了，打了两仗后，眼看着死了几个弟兄，有两个受伤的也被民团给俘虏了，其他弟兄们也都跑散了。我先是跟一帮腾冲人走在一起，有天晚上大家正在山坡上睡觉，被民团偷袭过来，又打散了。我找了个竹蓬躲了一夜，次日早上我看到一伙景颇营的路过，就跟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人会说本地语言，到寨子里还能要到吃的。走了两天，又被缅军直升机打散了。我背上也受了伤，在山上躲了两天。等到伤口不怎么疼了，我才偷偷地于夜间摸进个寨子，找到个老乡要了些吃的，跟他换了衣服，枪也给了他。以后就昼伏夜出，饿了摘野果吃，渴了找山泉水，也不认识路，只知道应当朝北方走，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七拐八弯的走回了根据地。找到我们班以后，仅剩的几个弟兄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那时已是骨瘦如柴，衣襟褴褛，胡须满面，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气的是那个河南籍的从正规军来的连指导员，他不但不表示一点慰问，竟然责令我回去把枪找回来。我们班几个兄弟当场揍了他一顿，第二天就把我抬回了瑞丽县医院，全体溜了号，回来继续当知青。

我这两位朋友后来的遭遇也大不相同，前一个伤愈出院就按伤残军人待遇安排到一家大厂当保卫干事，后来又进了公安部门。后一个则又在农村当了五年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进了一家小厂，现在已经下岗了。

事后总结，大家才发觉这次咱们“共军”吃了个大败仗的问题是过于轻敌。那缅甸裙子兵几乎是未发一枪一弹，就把缅共近万名精兵打得弃甲而逃，靠的只是战略方针正确。当时，缅甸有两支精锐之师，一支由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另一支则由苏联培训的军官指挥。他们早已洞悉“共军”意图，将计就计佯做援南坎之状，暗中却在腊戍周围伏下重兵，等缅共入瓮。照常理，缅共此役极可能全军覆没，片甲无归，可能是缅甸政府怕惹恼了中国人，网开一面，放走了大部份缅共，大多知青也因而得以生还。但也还是有一批知青，从此留在了异国那边的大山之中，尸骨至今不知散落何处。

在我插队之处邻寨，有个姓白的知青，人称小白，为人极讲义气，写得一手好字，更有一绝，唐诗三百首倒背如流。他本是家中独子，不必下乡的，可他不愿一个人进厂，就主动申请跟同学们一起到了农村。这步走错了不说，他又一时冲动跑去当了缅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消息传到昆明，他老母亲立时就疯了。一九七〇年我上昆明探亲，二十多名知青约齐了买了东西去看他母亲，老太太把每个男知青都认作自己的儿子，一个个拉着说些对小孩说的话，说得众人都泪流成河。直到现在，他的同学时时都会相约去看看老太太。说来也怪，那老太太平时神智不清，但好像有一种直觉，凡是知青，不管见过没见过，她一见就认作她儿子，没当过知青的人去了，即便也是小白的同学，她都不认。

由于吃了败仗，那缅共东北军士气极为低落，加之原就是些乌合之众，纪律涣散，军官贪脏枉法，拉帮结伙，打骂士卒，知青们本来就是一时冲动去当的兵，那里受得了这些，于是乎一走了之，只留下了一些意志坚定者。也有犯糊涂的，有几个知青，看到缅甸政府军生活待遇极好，而且颇受当地百姓拥护，不象缅共走到哪都不受欢迎，连蒋残匪都不如，便作出了错误决定，弃明投暗去了。不料那缅甸政府怕极了中国政府，周恩来让外交部照会过去，那边立马就将几个仁兄五花大绑地给送了过来，只有一人在过江时跳水逃脱，其他人则进了县大狱，以后就再也没了音信。

缅共的结局，我是二十年后听一个四川知青说的。一九九〇年我到怒江出差，与他同住县政府招待所里，我两人一见如故，一瓶老酒、一斤猪耳、半斤花生，整整吹了一天一夜。这位仁兄曾经任过缅甸一个很有名的民族首领的贴身文官，很受那首领的赏识。该民族与缅甸政府和解后，成立了民族自治邦，他被派往紧接中国怒江地区的一个区任区长。他经常到中国来，四川老家也时常回去。这次过来，是准备与云南某水利设计单位洽谈建设水电站之事。我听他侃侃而谈，心态平和，一心为自己的子民谋事，深感此君已然成为缅甸难得的一任清官。很巧，因为他人长得白净，众人都叫他小白，以至于他原本姓什么反而没几人知道。

以下故事，便是从他口中听来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的政治边防不再提了，中国军人也从缅甸撤了回来，缅共也失去了中国的军援，东北根据地很快就沦陷了。缅共中仅存的几个知青，凭着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大都已经当上了缅共高级军官，各自率领着一拨子人马，在异国大山之中建立了自己的领地。由于没了军饷，迫于生计，他们多数走上了种鸦片烟、制海洛英之路，当起了山大王。知青本就有文化，为人也还诚实，与各种地方势力大都能相安无事，经商之事也越来越入行，渐渐地便一个个富了起来。

也是普天之下相通的规律吧，这一富呀，就有人眼红，最眼红的却是那缅共中央委员会。

此时的缅共中央，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中国的援助大大减少，那几个中委从不断减少扣发军饷直到完全断绝给部队任何钱粮，让部队学南泥湾精神，他们几个则全家吃中国的皇粮。当兵的饿得肚子疼，这几位甚至在昆明还建有自己的行宫。等看到军官们富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要求各部队上交收入，跟国内要农民上交提留一般逼得忒紧。逼急了，众军官们也就是知青们带头开始抗税，连原来最听话的几个民族军官，也开始抗旨。当时的缅共中央头目们，认为就是知青在作怪，便设了个“鸿门宴”，假称开会消弥中央与地方矛盾，要众知青将领去出席会议，暗中却布下了听指挥的重兵，欲将知青们一网打尽。到了开会那天，众知青将领们都到齐了，无一缺席。大会开到半程，只见那缅共中央主席忽然走入内室去，随后便是一声锣响，会场外立即冲进大批精壮的少数民族士兵，把个会场围得个水泄不通，众知青不明就里，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知青中官至副司令那位老兄，跳上桌面，大喝一声：“拿下”，只见那帮民族兵，子弹上膛，手舞长刀，把那伙子中央委员们一个个绑将起来。众知青们虚惊一场，方知那帮坏家伙设下了毒计。那些家伙们却不知那知青副司令早有察觉，暗中已将情况摸清，便悄悄地与民族兵首领串通好了，将计就计来了个宫廷政变，一天之中就把那缅甸共产党给灭了。他怕人多嘴杂，硬是连最好的朋友都没给透个气儿，这也可能正是他能成功之理。只可惜因为那些民族兵太憨直，见到那个中央主席（我这里给他留点面子，不呼其名）浑身哆嗦，以为他是个不管事儿的糟老头子，没碰他就让他滚蛋了。那家伙急忙逃到中国境内，后来死在昆明他的行宫中，实在是便宜了他了。（当时的缅共领导人名叫德钦巴登顶——编者）

此一变后，原缅共军队在知青率领下，与缅甸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各民族领地都实行了真正的自治，知青们有的仍然占一片领地为王，也有带着妻小，到缅甸城市中去经商，多数已经致富。

这四川知青小白的故事讲完了，知青们在缅甸的革命也就此打住了。

数年之后，曾经被众知青认为当缅共时已经战死的兄弟俩，忽然现身昆明，据说俩人已经成为西亚有名的富商。他俩到昆之后，才发现父母均已不在人世，哥俩在父母坟前大哭三天，之后广发英雄帖，在昆明最好的酒店宴请所有知青，我当时不在昆明，未能参加。这哥俩走时，为俩人原同寨子知青每家都买了数万元的物品。

再往后，知青当缅共之事，便被世人渐渐淡忘了。若非那伙一心想卖乖讨好领点御赏的文痞们弄了个《切·格瓦拉》出来现眼，老汉也真不想说这档子事儿，这老了、老了，反正也无所谓了，说出来给大伙提个醒：再有那舞刀弄枪打混战之事儿，别去凑那热闹。那切·格瓦拉压根就不是个玩艺儿，年青人们可千万别学他，你得时时记着，你家里老母亲惦着你哪……

~~~~~

## 【五洲震荡】

### 从跨国革命到跨国犯罪

• 刘晓波 •

近年来，警匪片成为大陆银屏的一大景观，从大要案的纪实剧到虚构的惊险剧，黑社会和贩毒成为这类连续剧的主要素材。我很少看电视剧，偶尔看到了一部收视率颇高的《冰毒》片断，引起我的兴趣，于是就接著看完。我感兴趣的不是明星王志文和蒋雯丽，也不是复杂的剧情，而是剧中的主要配角——统治著金三角地区的大毒梟。

在此剧中，此毒梟是坤沙覆灭之后的权力空白的填补者，控制着金三角地区的毒品交易，

其地位俨然是占山为王的土皇帝。而在此之前，他最引以为傲的光荣经历是文革时期的造反生涯，而且，他还具有远比其他老红卫兵更惊险更传奇的经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献身于世界革命，去缅甸参加当地的毛式游击战。

有过文革经历的人，对那段历史都不陌生。1966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打碎旧世界 创立新世界》一文。该文豪情万丈地宣告了世界革命的开始，红卫兵就是解放全人类的急先锋。1967年，由红卫兵集体创作（主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朦胧诗奠基者”的食指）的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风靡一时。该诗所表现的那种横扫世界的英雄主义豪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扩张野心，已经达到了毫无常识的疯狂程度，直到文革后期还在青年人中流行。它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怎样投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又是怎样驰骋欧洲，饮马顿河，占领莫斯科，如同苏联红军在二战中攻克柏林一样；又怎样抽美洲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尖顶，如同当年解放军攻占南京一样。正是在这种疯狂的革命乌托邦的鼓动下，红卫兵冲砸焚烧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骚扰国际列车，最极端的狂热者不满足于国内的暴力造反，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称霸世界的权力野心），偷越边境，潜入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投身于当地的红色武装斗争。其中也确实有人牺牲于冲锋陷阵的沙场，长眠于亚热带的丛林中。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仇恨教育、暴力崇拜和权力争斗，绝对相信毛泽东的信口雌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世界的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

有了以上历史背景，我们再回头看此剧，就会悲哀地发现：现在的国人，尽管把文革称为“浩劫”，但是，当年参加造反的红卫兵群体，仍然固守著文革的“青春理想情结”。他们不但对当年的打砸抢没有丝毫悔意，对他们的受害者全无歉疚，反而通过文艺创作、影视作品、学术争鸣、回忆文章、集体聚会和重返知青点等形式，表达着强烈的青春无悔的怀旧情绪，此剧也不例外。编者竭尽全力要把这个大毒枭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者，甚至可以称之为“哲理化毒枭”。他已人到中年，集智慧、博学和野心于一身；他谨慎低调，却工于权谋，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满脑子驭人之术，每个细胞都洋溢着阴暗的权力欲；他叼着烟斗，说话抑扬顿挫，满口人生哲理，讲的无非是怎样实现统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贩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红卫兵时代）的理想。

由世界革命的战士到跨国贩毒集团的头目，角色的变换并没有改变老红卫兵的本色——用革命理想主义包装的权力野心和暴力手段。他具有顽固的文革情结：虽然腰缠万贯，但他穿的不是名牌西装，住的不是豪华别墅或总统套间，而仍然是一身将校呢黄军装，戴著毛泽东像章，住在简朴的木质平房中，他的主要助手也是一身中山装；他回忆往事的口气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对造反青春充满了混杂著骄傲和遗憾的深深怀念：骄傲的是曾经叱咤风云的辉煌，遗憾的是没有通过造反实现其权力野心。他解释自己为什么坐上了现在的大毒枭交椅，其理由与所有的独裁者一样：“这里的人们需要我来统治——如果我不出山，他们吃什么？”活脱脱当地人民的大救星。

当年的红卫兵变成今天的大毒枭（或大商人大作家大官僚），跨国革命变成了跨国犯罪，既准确地表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准确地勾画出国人的劣根性：主奴二重性、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革命造反和贩毒赚钱皆是为了从奴隶变成主子。当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与时俱进地利用邓、江时代的金钱至上来达到。正如大毒枭的自我表白：在革命时代，暴力就是权力；而在商品时代，金钱就是权力。

这让我想起由当年的知名红卫兵转变为如今的知名作家的张承志。他高举的抵抗商品社会和大众文化的道义大旗，旗帜上写满了由伊斯兰信仰和毛泽东情结混合而成的仇恨意识和暴力哲学，他坦称自己的红卫兵情结：“我的历史是从1966年开始的”，“要是任何人问我，我创

作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红卫兵。”真可谓：岁月流逝而青春依然。

这也让我想起制造了大量的畅销文化口红的余秋雨，面对自己文革中御用文人的经历，他非但没有丝毫自省和内疚，反而公开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从“石一歌”的革命高调《文化苦旅》的怀旧低吟，他对传统文化的港台式矫情，他用有利于改革的借口为腐败所作的辩护，与当年以笔作刀枪的大批判一样，皆是在做当权者的刀笔吏。

中共执政后的中国，表面上，时代在变，社会在变，观念在变，每个人的角色也在变，而骨子里，政治独裁、人性贪婪和御用工具的民族根性却一以贯之。

~~~~~

【凄美青春】

关于知青生活的回忆

• 李 四 •

当过知青的人在大学里不多见，去年随著兰调出电子系，能在大学讲台上站住脚，而且没有摘掉工农兵学员帽子的人在茜所在的大学就完全消失了。当过知青又凭着考试跨进大学的如今还能见到几个，也多属于苦干型。伴随师资审查的正规化，越来越多的博士、博士后携妻带子从四面八方进驻高校。其辉煌的学术背景中多与名校、名师相伴，很少再见到“插队知青”的字眼。在学术界“知青”经历已无法为人所津津乐道，因为毕竟那是一段属于过去的历史，与学术研究并无直接关联。

“知青”是个大概念，其间每个人的经历都与他人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系统学习的长期中断。1966年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全部瘫痪，所有中国青少年都在国家强制性政策下投身到政治运动中来。那年茜该上五年级。67年学校复课“闹革命”，每周两节数学，两节语文，两节英语。每天早上天天读，把一本小红书当成“圣经”，反复高声朗读。即使如此还难以保证每天坐在教室里，学工，学农，学军，挖防空洞，拉炼，批林批孔，各种政治运动像连续不断的波浪，把正常的课堂教学冲得七零八落，根本谈不上知识的系统传授。一位老师痛心疾首地说，你们在浪费青春。三十多年过去了。那课堂上老师沉重的语调和严肃的表情始终留在茜的脑海深处。她不想这么学，曾问过班主任老师，为什么不多开设几堂数学课，因为她非常喜欢数学，老师立刻警惕地问，为什么是数学而不是政治？

老师们也是迫于无奈。学校采用的是延安中学教材，各个章节之间根本不具备连贯性，内容完全是基于工农业生产中可能出现的实际案例，其跳跃式的知识结构让学生从天上到地下找不着门。于是在1973年所谓“回潮”运动中，老师们大胆地抛开公开教材，自己为学生刻印讲义，使学生们能够真正接触到中学课程。那学期的三角函数由范老师讲解，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老师精彩的讲解使学生受益非浅。恢复高考后，范老师成了国宝级的特级教师，学生、家长、学校领导都视若神明。当时的好景不长，很快就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年之后，茜中学毕业插队去了。

茜在农村劳动四年，春种秋收，大田，砖厂全干过。她拉过礅子，挑过粪，锄过庄稼，割过麦子，收过大秋。有一次兄弟去看她，正值一伙知青和农民在地里休息，大家一起窝在背风的山坡后晒太阳，远远看见兄弟来了，茜赶紧起身相迎，兄弟差点没认出来。她披头盖脸全是黄土，衣服裤子补丁罗补丁，脚上的解放鞋已磨出大洞。兄弟难过得眼圈红了，她却没觉得有什么。在地里劳动穿什么好的。需知那时她正值青春年华，是应该懂得美的黄金岁月。

知青生活虽然很苦，却生活在一个单纯的时代。那时的农村山青水秀。春天播种季节，人们出工早，朦朦云雾中，秀姑牵著驴，彭叔摇著篓，茜在几步之后拉着×子，那是由三块圆石头制成的工具，种谷子时，需要用它来保（土商）。不远处，村里炊烟袅袅升起。太阳升起后，晨雾散去，满山梁粉白色的苹果花海浪般浮出云层。站在地里闻著田野的芬芳，如果你不是那拉×子的人，眼前的情景真是充满诗情画意引人遐想。

那时农村缺医少药，茜所在的第三生产队离大队卫生院很远。因为茜在中学时曾到医院学过打针，全生产队人开回的针剂便都由茜注射到人体里去。说来也怪，四年里打过几百次针，竟没出过一回事故。其中不乏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素之类的药。当时是“无知者无畏”。有些小孩才几个月大，小屁股只有一巴掌大，居然没给打瘸过。全村百十口子谁要打针都找茜，几年中也为当地人搭进不少酒精，药棉，针管。但这是一种信任，为此茜不觉得吃亏。

麦收前，河滩麦地一片金黄。当太阳快落山时，火红的霞光把天边的云镶上金边。农村的沟沟梁梁变得美焕美仑。“你知道为什么晚霞比早霞红么？”问话的是另一个生产队的知青晨光。他是茜中学同学。在知青中属于比较有知识的人。他是她心中的偶像。她知道自己愿意和他在一起，也明白这种隐藏心中的感情是多么诱人。那时她在砖场翻土，到大田挖沟，有时能和晨光分在一处。每当这时，沉重的劳动变得轻松愉快，一铲土，一锹泥都便成了快乐的音符，劳动成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她愿意在休息时和晨光谈理想，谈政治，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她愿意与晨光一起谈历史，谈文学，翻腾脑海里那些可怜的知识储备。时间在这里变成了欢快的小溪，一路唱著快乐的歌，淌过农村广袤的大地。直到有一天晨光背叛了自己扎根农村的誓言返城工作了，插队生活又回到从前。二十几年过去了，他们再也没联系过。有时站在夕阳下，茜的耳边还会响起那青春的声音，“为什么晚霞比早霞红？”你找到答案了吗，朋友？

人生是一个过程，与青春相关的岁月就是苦难都带有某种凄美。为此，茜从不去追忆。离开那个村子已经二十多年，她从没回去过。插队本身是以牺牲教育为代价的。不管插队时间长短，在文革期间所有人都在对文化的革命中损失了十年的宝贵光阴。有些人可能因此而永远改变了生活轨道。没有文化基础的人是永远无法创造生活改变命运的。如果你插过队，又没有因此而丧失求学机会，那插队生活就可能成为你的财富。知青文学、知青回忆多出于当前过得比较得意的人。那些下岗职工是不会把当年在农村的经历常常挂在嘴边的。

当过知青的人可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比较能吃苦，而且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知青生活的磨练，而是由这代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所驱动的。这代人习惯于把工作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习惯于以对工作的全力付出而赢得别人的尊重。究其深层的成因无法排除因知识空缺所形成的后劲不足。在后来者咄咄逼人的气势中，这帮人多处于守势，成倍付出而换回的往往是并不那么惊人的学术成果。正像学校一位年青领导所评价的，你们对学校有苦劳没功劳。

作学问有一定的内在张力。当代学者能够顺理成章地读硕士，读博士，能够沿著一定的学术轨道前行，在惯性和周围力量的推动下，很自然的形成学术观点和文字表达。而当过知青的人“自学成才”者居多，易于形成散漫式思维，思想缺乏连贯性。有时感性思维多于理性，情感大于行动。在一个特定群体中，如果仅有一人具有这种特性还可以解释为个案，而当时很多同龄人都在发出这种感叹时，我们就不得不去追溯那留在身后的轨迹了。

往昔的岁月已成记忆，插过队又在学术界奋斗著的同龄人们，谁也无法抹去曾经有过的生活，谁也难以释怀伴随青春走过的人生履历。回忆感叹对当前已毫无意义。即使对后生晚辈谈起，也不可能使对方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只能嫌你唠叨。知青岁月已被人写得差不多了，随著

一代人历史的翻过，知青生活已变为一些老人心中抹不去的历史，不会轻易提起，也不会轻易忘记。历史已成为过去，难道还指望当今的领导人为你偿还青春么？

~~~~~

## 【悲哀年代】

### 我记忆中的知青

• 程美信 •

我家乡在皖南绩溪的偏僻山村里，小时候，我家楼上住了一班来自上海和马鞍山的知识青年，但到底住了几个我现在不记得了，只是记得他们进进出出的好大一班人马，几乎使得楼梯楼板都要崩塌的地步。如果没弄错的话，那大概是在外大队的知青经常来串门，不然我家的楼阁上只有一间空房，至多只能住七、八个知青。

其实，我当时不过四、五岁，所能记得在我家落脚的知青的事情显然不多，只有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还略微记得，有的事是在他们走后的若干年里人们常提起的。有一点，我家阁楼上的知青经常打架吵嘴，因此，我父母和爷爷经常上去劝架。另外，每每他们回城探亲回来，多多少少要带一些糖果回来，这一点我忘不了。记得有个叫卫平的知青从马鞍山回来时，带回了五颜六色而小圆豆般的糖，我至今记得那糖的颜色而不知味道如何。令我最记忆犹新的是夏天里，知青们成群结队地去池塘里游泳，村上的小孩们跟去看热闹，那些大孩子们则跟他们一起学游泳；这是令年幼的我所羡慕不已的。其中有个叫“郭良”或者“韩良”的，因特别会游泳而成为深受村上男孩们崇拜的“好汉”，加之他戴着一幅眼镜，这使我能够隐隐约约记得他的模样，若干年后我才听人说他“犯错误坐了牢”，据说他因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而犯了错误，其实我们村上的人们一直不知道郭良的具体下落，只知他因主席像的一事离开了我们村，之后便杳无音讯。但关于郭良“犯错误”说法却很多：说石膏主席像是他不小心打烂了，由于与他有矛盾的知青举报告密才使他倒了霉；也有说石膏像不是他打碎的，是有人恶意嫁祸于他；也有人说他脾气不好打了主席像。这些都是我们村上人说法，哪一种说法的真假则无从判断。不过，我家楼上一直有个破主席像，在知青走后的一些年里，那个破碎的主席像还摆在楼阁的一角里，因为它会使人“犯错误坐牢”，我见了它便心里发毛，生怕弄不好自己也“犯错误坐牢”。

我记得知青们吃池塘里的贝壳肉，弄的满院子里的腥味和苍蝇；还有是杀狗吃狗肉，当时，当地人压根儿不沾这些东西。还记得他们常常把村里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开批斗会；他们人人手里都有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我现在不记得这种棍子的名称。当然，我也记得我家那楼阁里曾经有过拉胡琴、笛子和口琴的声音，有时还有叫骂声和打闹声。

我八岁那年，马鞍山知青卫平专程回我们村上来看望乡亲们，这事情成了村人一时的美谈，因为这批知青中唯有他一人回来看望过大家。与此同时，卫平还特地为我爷爷带来一双45码的解放鞋，只可惜他不知其时我祖父已去世半年了，我爷爷生前曾穿过唯一的一双非手工制作的解放鞋，它就是卫平从马鞍山为爷爷定做来的，我爷爷因为人高脚大，并生活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一生除了打赤脚之外，只穿过手工制作的草鞋和布鞋。据说爷爷爱惜那双解放鞋胜过爱惜自己的性命，一次扛木料到四十余里山外的旌德县去卖，回来时竟然将他的宝贝解放鞋夹在腋里舍不得穿，光着脚板走了几十里山路，一路上引起人们的好奇与疑问，由此成了乡间一大趣闻。现在我知道，45码的鞋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难买，我因自己穿46码的大脚在中国大江南北都买不到鞋子，进入成人之后一直裹着脚丫过日子，直到来到海外才彻底的解放。所以，我现在知道卫平为帮我爷爷弄到那双解放鞋是多么的不易，尤其是在那个日用品和工业品非常紧张的年头里。可见我爷爷那般珍稀那双鞋似乎一点儿不奇怪。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晚上，奶奶房里坐满了一屋子人，他们都是来看卫平的，而我奶奶面对摆在桌子上那双崭新的草绿色解放鞋，哭了一遍又一遍，边哭边说：“老鬼（家乡的老婆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老鬼”，并非死后的称呼）啊，你好没福分啦，卫平又把做来了鞋子，可你却去做鬼了……”。卫平也在掉泪哀哭，我爷爷一直有恩于他，他老人家疼他远远胜过自己的儿女，卫平是那班知青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初到我们家不过十五、六岁，所以经常遭到同伴们欺负和殴打，我爷爷一直护卫着他，与他同来的知青们都回了城之后，最后剩下他一人，还在我家多呆了一年才回城，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那些年里，卫平几乎成了我家的正式成员。九一年，我在海外得知卫平再次到访我的家乡，可见他对我那家乡的感情是非同一般，那片土地里埋有他的青春年华，同时还有他的情谊世故。我记忆里的卫平还是当年的那个卫平，他现在该是五十出头了，但我很难知道他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旧地将有何感想。

来我们村插队的最后一批知青，我却记得一清二楚了，因为当时我已经进小学。她们是五个来自屯溪市（今黄山市）的女孩，我们村各队安插了一个，其中一个是我表姑的女儿，叫邵碧云，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现旅居加拿大，她因外婆家关系而来我们村插队，所以她一直住在外婆家。其他人开始安插在各生产队的社员家，可没多久都与落户人家不欢而散，毕竟城里人优越惯了，不可能象农家女孩那么勤快好劳，由此必定给落脚人家带来额外的负担，从吃菜、用水和烧柴都意味着付出体力劳动。因此，女知青成了各队的一项负担，她们不能干农活倒事小，吃用开支全在生产队里领取，这使得社员愈来愈不满。公社干部为了解决女知青们生活问题而到各个生产队开社员会，做社员的思想工作，最后还是让四个女知青集中到一间校舍里居住。后来，这些知青几乎从不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只待在我们村上混日子，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二流子”。吃饭的口粮显然不成问题，不论有没有工分，基本口粮还是可以在队里去秤，她们因此是各队里典型的“超支户”。基本口粮显然不够吃，全村一大半以上是缺粮户，但农家毕竟通过自留地和“非法地”（私自开荒的地）里杂粮来弥补口粮的不足，可知青的人头自留地和菜园却长年荒废，若不做人情的话，那将必荒不可，成了村野里难得的景观，毕竟那是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头，不可能有荒废的自留地。所以，知青长期的菜源是靠这家给、那家讨，或者今天这家蹭一顿、明日那家蹭一餐，也许她们是女孩的关系，始终受村上人的可怜和照顾。但对她们自己而言，那种日子是煎熬而委屈的。好在知青受公家的特殊照顾，油粮不够吃可以从国家粮站里供养购买，这是一般社员所享受不到的待遇。

女知青的娇与懒是不争的事实，连她们做饭的柴和吃喝的水都常常请小孩子代劳，我就帮她们做过这些事。还记得她们纵容我跟其他的小伙伴为她们偷生产队的玉米回来煮吃，还有就是把校舍的木窗和无人要的破棺材板用来炊饭，此事招致村人不可谅解的非议；前者是公共财务，后者则既不卫生又有伤风败俗之嫌。值得一提的是，知青的住点是孩子最爱去的公共场所，遇到她们不高兴的日子里，我们去就不免挨骂；当然我也见过女知青间打架和吵嘴，一次有两人互相抓着对方的发辫，彼此对峙老半天也不松手，直到村上大人前去排解才宣告结束。

要问这五个女知青在我们村上最大成绩是什么？那无疑是她们给我们村里在农闲时带来了精彩的文娱活动。那几年每冬必有排戏演出，几个女知青占了大头戏，村上为此专门搭建了戏台。其中有个叫安敏生的女知青，不仅性格活泼，而且能歌善舞，故而村上人叫她“呆敏生”，因为“安”与“呆”在我家乡方言中同音，“呆”则是疯、傻、痴的同义，安敏生歌喉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乡亲们，记得有次《枫树湾》演了一半，水电站的机器出了毛病，台上台下一片漆黑，安敏生一人唱了一夜戏，几乎当时流行的歌曲她都会唱，并是那般娓娓动听，掌鸣声和叫“好”声不绝于耳。

呆敏生不失为“呆敏生”，她险些死在我们村上。大概那是全国知青闹回城的时候，在我们那山角落里的知青们也闻风而动、情绪不稳，另外几个大队里的男知青们便成乡间的害群之马，

上头管不了他们，下头人惹不起他们，打架斗殴、偷鸡摸狗之事时有发生；有个知青因磨刀扬言要杀公社干部而名噪一时，当地农民与下乡知青的关系一度紧张。可我们村的知青毕竟是女性，她们除了一如既往的娇懒之外，并无其他歹恶。可安敏生就在这时出了事，有两个来走访的男知青在我们村上住了几天，随后离去，村上一下子议论开了，说安敏生和另一个女知青，与这两个来访男知青同住一屋过夜，公社里也下来人对此事进行调查，给予她们批评警告，两个女孩深感冤屈与不满，一气之下便服下了农药，幸亏即时发觉，村上的赤脚医生懂得灌水洗胃，不然两条年轻生命因可畏人言而白白送死，尤其性情刚烈的安敏生有一死了之的决心，喝下不少农药，几天几夜不省人事。

这下可好，我们村上象是捅了马蜂窝一般，地区里、县里和公社都来了人。安敏生父亲是军分区的干部，当下就将安敏生带回城去了，她从此一去不返回，再没有她任何一点音讯。但愿她现在生活得非常幸福，我为她在我们村上所受不幸遭遇感到难过和内咎，希望她不要因此记恨我家乡人。但我想，安敏生今天一定为她当年的犯傻而感到不可思议。据传，那两个男知青因此事件而被捕了，如果传闻确切的话，我真为那个时代和那时代的青年感到悲哀和委屈。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在伤痕文字里有农民兄弟对女知青进行性侵犯的描写，这在我们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连男女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弄不好视如“破坏军婚”论罪，这是农民兄弟不敢过近女知青的重要原因，莫非是吃了豹子胆的好色之徒。不过，我们公社倒有几个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她们是最初响应“扎根农村”号召之下的主动先锋，可她们的夫婿往往是乡村里“美男才子”，否则女知青决不会轻易下嫁。至于其他地区的知青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无论怎样，中国青年从来都不是幸运儿，更何况那悲哀年代的知青们？

□ 《民主中国》二〇〇一年九月号

~~~~~

【甘苦人生】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 章德宁 • 岳建一 •

她的故事，就像信天游，被黄土高原淳朴的人们创作着，传颂着……

◇ 如果世上有卖后悔药的我花多少钱也买

第一次见面，在宜川县医院宿舍院。

王春英很冷漠，进屋让我坐下，自己却站着，好像随时等我出去。她双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说吧，还谈什么？该说的早说过了，没什么好说的。别再采访我，我都烦了。你们出书了，上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还在这儿呆着？”

传说中的黄河船工二缠子——周延才，站在她身后，中山装敞着怀，脚踩毛绒绒的棉拖鞋，花白的平头，一手叉在腰里，很有男子气。

“去吧，去吧，”他说，“跟北京老乡聊聊，人家老远来的，你中午回来。”

王春英没再说什么，就顺从地跟我走了。

在县招待所，她低头对我说：“我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善良，那时太苦，谁对我好，就跟

谁了，没想以后，更没想怎么带他这几个孩子。我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回去，实在办不回去，退休也要回北京去！”

我吃惊了，这怎么不像传说中的王春英？

“我们几个在这儿结婚的北京同学，凑在一起，老是后悔。我跟他们说，后悔有什么用？如果世上有卖后悔药的，我花多少钱也买！都怪咱们当初没脑子。”

“当初不是他救了你？”我问。

“瞎扯！哪有这回事。不信你问他去。”她扬起头，非常生气。

“那你当初不爱他？”

“那叫爱呀？公社五花大绑把他绑走了，说他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候，这个罪名要判十几年刑！我去找人，公社说，要不你们就办结婚证吧？我说，那就办吧。事儿是我惹的，他婆姨死了以后，我老去他家帮忙，弄得人家都以为有什么事，我不想连累别人。”

后来，在采访二缠子时我才发现，这件事上，他俩的说法不大一样。王春英当初不是迫于无奈。

王春英自己生的儿子，已经转回北京，她最担心的，是她这个上高中的女儿。“我想让她在北京上大学。在这儿，没前途，没发展。”

二缠子前妻的几个孩子，除一个在县城工作外，其他三个都在村里成了家。王春英想赶快躲开他们。

“有时驴死了、牛死了，就来要个二百三百，有时带着孩子看病来了，连吃带住，我都得管。满身是土，脏了吧叽的，还老不带着钱，吃药打针，都得我垫，你也不好要，自己娃嘛，好像就應該的。将来，等我那几个孙子孙女大了，再来这儿上学，那还有完？”

她详细告诉我，如果我想帮忙，应该从哪入手。

“你回北京，你家掌柜的怎么办？”我问。

“他当然同意。我先和小女子回去，他退休再回去，可以给人看大门看自行车，他现在在医院烧水，在北京，他也可以给人烧锅炉看大门嘛。”她说得很轻松。

“你家掌柜的今年多大？”

“五十。”

就是说，二缠子等到退休，还有十年。后来我知道，在这件事上，他俩的意见，也不完全一致。

我提出，去她原来插队的村里看看，她不想去。“娃家里穷，脏得很，还有虱子，你不怕？”

经再三恳求，她勉强答应，一再叮嘱：“咱们可说好，我不在那住，要住，你自己住！”

◇ 周家都是老实人

破旧的吉普车，在狭窄颠簸的山路上行驶，两边没有一点绿色，王春英坐在前面，沉默不语，对车外的一切，毫无兴趣。

开车的周师傅，是二缠子本家，比二缠子小两辈，王春英知道后，开始问这问那。

我给周师傅递烟，她示意我点好了再递。然后对周师傅说：“按理，你还得管我叫娘（奶奶）咧。”说得周师傅哈哈大笑。

途中上厕所，她问我：“你要这车多少钱？”

我告诉她。

她责怪我：“周家都是老实人，生活不容易，你干嘛压这么低？”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不容易，他不是承包了这车？”

她摇摇头：“你看他抽烟能看出来。北京人就是这样，我妈在农贸市场买菜，几分钱还跟人家抠，我们这嗨儿人可老实，从来不这样。”

汽车经过新市河地段医院，王春英要求停车。她跳下车，带我爬上石阶。在一排破房子前，她要 and 几个农村姑娘合影。

我问：“这都是谁？”

“同事的婆姨，那时我在药房，我家掌柜的管收费，我们带着小女子在这儿住了四年，她们对我可好。”

“你看那边，”她拉着我说，“我来的时候，我家掌柜的牵着小毛驴，就在那接我们，他这人不像一般的农民，可聪明，爱说个笑话，人可有意思。”

“他有文化吗？”

“初中，你别看他这人，什么都会，吹口琴，拉胡琴，会打石碾子，就连赌博也老赢。现在人家每天都看新闻，哪个领导访问哪，记得可清了，我老托人给他带杂志看。”

“是什么杂志？”

“那叫什么？《新华文摘》吧。”说着她脸上有了笑意。

后来我问二缠子，二缠子说：“我哪有什么初中？有小学就不错了，我现在看看还行，说写，还老写不好。”

王春英又拉我到路边，“你看，我们吃完饭就坐在这儿，看路上的汽车，脚下这是云岩河，

能一直流到黄河去，水可清，可凉，夜里睡觉，能听见它哗哗的声音。”“你看这石桌，我们中午还在上面睡觉，凉凉的，可舒服。”“来，咱俩在这合张影吧。就在这桥洞下面。后面要这山，还要这条河。”

耀眼的阳光下，王春英在石板上跳来跳去，好像换了一个人。

中午，来到阁楼乡，我请她和周师傅吃饭，王春英要给村里的孩子买吃的。我说：“你看买什么？我来。”

她犹豫了一下：“买20个馍吧。咱们几个回去，得在娃家吃饭。”

我拿出塑料袋，让店主装了30个馒头，问：“还要什么？”

她拿了几包两毛一包的瓜子，一斤5元的糖，说给孙子孙女吃。想了想，又要了一个水果罐头、一小包餅乾、两包一元一包的工字烟，说是给哥哥。二缠子从小失去父母，只有村里这个哥哥把他拉扯大。

“28年了，你说话怎么还是北京口音？”我问。

“没变吗？”她笑了，“我有意扳着呢！一回北京，我妈老嫌我说话土。我只好扳着点，不过也老忘。”

果然，在阁楼乡，一碰上满身是土的乡亲，她又是陕北腔儿了。人们都跟王春英打招呼，让她到家里去坐，她也动不动就掀帘进去，害得我直担心上路的时间。

“这嗨儿我也呆过。”她说。“那时我家有彩电，别人都来看，土哈哈的农民，还带着孩子，进屋就脱鞋上床，有时孩子就尿在屋里地上。我给他们倒水，准备吃的，我们关系都可好，没有什么北京人，也没有谁看不起谁。要是在北京，能有这感情？”说着她白了我一眼。

北京17年，陕北28年，王春英的心，究竟离哪边近呢？

◇ 甬管谁给的都是自己的娃呀

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小山村，至今没有通电，每周定期放水，5毛钱一汽油桶。农民有买不起的，就赶着瘦弱的小毛驴，走几里山路驮水。只要有依山朝阳的地方，就会有几面窑洞，门上挂个破布帘子，就是一户人家。狭窄的黄土小路，忽上忽下，把这些破窑洞连在一起。

王春英领我走进一扇破门，告诉我：“这是我三娃家，我原来就住这儿。”

窑洞很深，空空荡荡，足有五米长的大炕，炕上是几摞黑乎乎的被褥，地上一个破柜子，和几口盛水的大缸。

一进窑洞，王春英长舒了一口气：“可到家了。”说着一偏腿，坐在炕沿上，顺手拿起一条脏毛巾，掸衣服。她把馒头拿出来和儿媳妇商量晚饭吃什么。

儿媳妇望着婆婆怯生生地说：“家里除了面，啥也没有了。”

王春英四外看看，“这是我老同学，不挑什么，就弄点山芋，再做上点面吧。”她招呼一个孩子去叫几个孙子孙女。不一会儿呼啦啦就跑回来六个，个个满身是土，小脸黑里透红。王春英摸着脑袋每人分了一包瓜子，几块糖，给我介绍：“这是老大家的三个，这是老三的两个，这是老四的一个。”

我问：“老二的呢？”

“他俩在县城，还没娃呢。”说到这儿，她忽然骄傲起来。“你没见我家老二哪，打扮得可体面，跟他们几个不一样，人家上的是省级中专，分到县水利局工作。那时老二一年年补习，考试，老是差一点点，他爸不想让他考了，我不干，我对几个娃说，你们几个，总得有一个给我念出来。我训他，逼他，给他创造条件，非让他考，后来还真考上了。”

窑洞的墙上，糊了不少《卫生报》。王春英说：“我专门为他们订的，我看完了，就留着，他们上去时，带回来，让他们两年糊一次墙，也显得里面亮些。”

她抱起老四的孩子，摸着小脸，心疼地说：“老四可怜，他哥没娃，从小把老四给了过去，我老觉得对不起他，等我将来退休了，就让老四接班。”

“老四给他哥时，你和你家掌柜的结婚了吗？”

“还没有。不过甭管谁给的，都是自己娃呀！”

“你家老大今年多大了？”

“比我小12岁，也是属兔的。结婚那会儿，最小的4岁，大的才8岁，下工回来，娃都睡着了，做了饭，一个个叫起来吃，有时看着几张小嘴管你叫妈，要吃要喝，也挺可怜的，那时他们都穿着破衣服，趿拉着破鞋，我就纺线，让别人帮着织布做衣服。我纺的线可粗咧！”

说到这儿，她笑了，并且有些得意，“这嗨儿的活儿，也就织布我不会，其它的，我都会做。”

王春英说起过去很轻松，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其实就在这条大炕上，王春英生下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怀儿子时，她怕人看出来，就用带子把肚子勒紧。生产时，她躺在炕上，任接生婆长长的脏指甲，在她身上胡乱动作，她连哭带叫，头往墙上直撞。

第二个是女儿，她自己接的生。那时没有酒精，她就用白酒把剪子擦干净，自己忍着疼把女儿生了下来。

她不愿在人前流泪，因为当初所有的人都劝过她。她不好意思见同学，因为好心的同学见她和二缠子结婚，都很生气。

为了多挣些口粮，村里的活儿，什么工分高她就干什么。粮食不够吃，一家人喝稀的，再不够，地里还有南瓜红薯，树上还有榆钱儿。她在地里干活，儿子就拴在家里。

在外面，她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回到家里，面对空荡荡的窑洞和满炕的孩子，就暗自落泪。

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回北京了。她站在窑洞前远远望着，走一个哭一场。二缠子劝她，她就和二缠子吵。

“我家掌柜的人好，善良，老实。如果这人是可有可无的，我拍屁股也走了。那年，我妈让弟弟带着路费来接我，我不走，我爸让我去兰州工作，我也没去。”

王春英的父亲曾是我国一个大水电站的党委书记，父母都很早参加革命，她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家里有保姆。现在父亲有病，也是住北京的高干病房。

“我妈来信从不提他，我弟弟妹妹也从不叫姐夫，我有时心里特别扭，结婚这么多年，儿子都这么大了，他们怎么还转不过弯来？我儿子说，妈，以后你回来，就住我这儿吧。”王春英说到这儿，伤心极了。

◇ 他在前面扳船我就跟在后面游

出了村，一条山路曲曲弯弯，在山梁间绕来绕去，山坳坳里，经常冒出一片片洁白的羊群，匝羊肚毛巾的羊倌，就在一边漫不经心地轰赶着。

我们呼哧带喘赶到黄河边，已是满脸通红。

王春英指着黄河大声说：“你看，我家掌柜的原来就在这儿扳船，我常从那儿下水，游到对面上岸。他船扳得可好，水性也好，每天能挣10分，是最高的！”站在黄河边，王春英扬眉吐气，两眼放光，像在谈一个英雄。“他人长得精神，一站船上，可帅气。他在前面扳船，我就跟在后面游。”

“他不是什么队干部，可队里有什么事都找他商量，他脑子好使，什么事都想得周到。大家可拿他当回事咧。”

“那年，我们背着我那个男娃回北京，就从这儿游过去，到对面临汾上火车，孩子在他背上让水呛得直哭，我们把衣服放在浑退（羊皮退毛后冲气的一种水上工具）里抱着。我家掌柜的边游边对我说，回去以后，要是你妈看不起我，我就走！”

“结果呢？”

“我们呆一个多星期就回来了。家里虽然烧了好多菜，就是没话，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有，那滋味也够难受的。”说着，王春英的脸色又暗淡下来。

王春英说着突然转头看我：“其实，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北京人有北京人的苦恼，陕北人有陕北人的欢乐，谁也代替不了谁！”

“我才来县医院几年？已经考下了护士师职称，我现在有好几个获奖证书。去年，我和我家掌柜的都是先进个人。他在医院水烧得好，卫生打扫得也可乾净，大家都尊重他，叫他老周。”

“我在医院每年抽查，病人对护士投票，我也总是最高。我对农民有感情，不巴结谁，也不看不起谁，出门在外，谁也不带着锅灶，人一辈子都是这样，对人好一些有什么不好？人混到这份上不容易，有时想想，回到北京，就再没有这些了。”说完她呆呆地望着脚下的黄河。

是啊，回到北京，就再没有这些了。王春英曾说，我什么苦都吃过，回到北京卖冰棍，卖报纸，白天黑夜的干都行，只要能生存，为的是小女子，不能让她像我一样。

但到那时，王春英心中的痛苦，会比现在少吗？

◇ 真想脱了衣服睡一睡这炕心里就踏实

回到三娃家，天色已暗，饭还没有做好，老三干完活儿回来，坐在门坎上抽烟，暗影里只看见他蓬乱的头发，和嘴里一亮一亮的烟火。

三媳妇用陕北话和王春英唠叨，说着说着还哭起来。她说老大从北京带回的那几件衣服，一件也没给他们，她嫌丈夫不能干，挣不了钱；她觉得娘家村儿比这儿富，当初看王春英是北京来的才嫁给老三。说着手下飞快地切着山芋片，一边还照看着灶塘的火。

王春英用陕北话劝她，宽慰她，然后小声告诉我：“她就是这样，话也说了，活儿也干了，几个儿媳妇，就属她利落。你看她身上穿的还有她娃身上穿的，都是我给的，我哪个娃也不会亏他们。”她接过儿媳妇手里的刀，麻利地切起来。

老三儿子的腮腺炎还没好，小脸通红，还在发烧。王春英疼爱地把孙子拽到怀里，在两边下巴处摸，“不行，这针得赶快打，药还有吗？拿来我先给他打上。”

三媳妇一听又嘟囔起来，“家里就这点花了（棉花），不卖花就没钱买药，现在卖花又价钱最低，想等等都来不及。”

王春英皱了下眉：“明天跟我去阁楼吧，我把药买下，你们带回来给娃打。”说着她蹲下身，把孩子衣服撩起来。

才几岁的孩子听说打针，乖乖地趴在水缸边上，亮着小黑屁股一动不动。

王春英打完针看我一眼：“瞧瞧，这嗨儿娃就是懂事，要是在北京，不知要闹成什么样呢！”

一大锅盐水煮面片，一盘馒头，几根炒豆芽，我们围坐在土炕上，狼吞虎咽。王春英端着大碗吸溜着：“快吃吧，吃完带你到我哥家去，再去刘堂家看看，以前我们可要好。”

晚间的山村飘着一股亲切的烧草味儿，不时听见几声细细的羊叫和孩子的哭声。她带我来到当年知青时住的窑洞。窑洞已经完全坍塌，只有几只小羊羔，围在那里静静地舔着草根。王春英有些难过：“唉！怎么就让它塌了呢？”

刘堂婆姨看到王春英，嘴咧得很大露出满口黄牙，她拉着王春英手迫不及待拽到炕上，俩人像多日不见的姐妹，亲亲热热挤在一起。

外面，天色已黑。窑洞里，王春英弯腿卧在炕上，团成一团，西服委得不成样子。在她眼前，似乎已经没有了北京，没有了过去，也没有了将来，只有温暖的大炕，可信赖的朋友，幽幽的油灯。

从刘堂家出来，四外漆黑一片，各家窑洞的油灯，都已经熄了，山村里，寂静无声，只有

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显得很乱。王春英好长时间不说话，我跟在她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

走着走着，她突然站住脚，黑暗中传来她切切的问话：“你说，在北京，能有这样的感情吗？”

我一下愣住，无法回答。是的，寂静的山村有它寂静的故事，喧闹的北京有它喧闹的声音，人，本来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出生地的区别，有时却把人拉开了。就像天上的星星，那里很亮，却离这儿很远很远……

回到老三家已经很晚。

王春英问我：“还洗吗？”

我说：“家里水少，我也累了，算了吧。”

“那就睡吧。”她爬到炕上，伸了个懒腰，“唉，真想脱了衣服睡，一睡这炕，心里就踏实，哪也没有这么舒服的炕呀！”

看我躺下，她把被子翻过来，为我盖上，吹灭油灯。

星光透过窗棱，撒在炕上，炕的那边，三媳妇咳嗽了两声，我闻着被子上异样的气味，听王春英用陕北话和儿媳妇拉起家常……

◇ 告别宜川

临行前的一个晚上，王春英找来几个在当地结婚的北京人和我见面。招待所对面的小饭馆里，我买了几听饮料，几袋瓜子招待他们。

口音还是地道的北京口音，相貌，已与当地人分不大出来。一位男士，嘴里叼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头发蓬乱。

他们七嘴八舌向我倒苦水，诉说着心里的不平衡。

说起来都管我们叫知青，我们还算是知青吗？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我们在这儿安了家，死，也是这儿的鬼，就凑合着过吧，等将来娃大了，我们也就完了。

我们这些人，有的在北京就和父母挤一间小房，有的父母都不在了，回去也没地方住。我们的婚姻，当初家里都不同意，现在孩子回去，家里都不爱看。我们就好像被人遗弃的一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宜川现在就剩下我们十几个了，整个延安地区也不过300多个。那回，北京来了好多当年的知青，就从我家门口过，也没来我这儿看看，我心里窝囊好长时间。

外面，歌厅里播放着流行歌曲《九百九十九朵玫瑰》，我问他们，你们喜欢听这样的歌吗？

回答是，顾不上或者不喜欢。他们说，只喜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类的歌，但不能唱，一唱，就想起过去，心里就难受，就想哭。

王春英对我说：“不要问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过来的，我们都记不清了，我们是有意识地忘记了，不想记住那些。我们的婚姻，家里都不同意，我们这些人都硬着这口气，不求家里。”

临走，我送他们出来，其中一个，又悄悄返回小饭馆，她用塑料袋把桌上吃剩的瓜子收起来，见我看她，有些不好意思：“还不少呢，带回去，给娃吃。”

回到招待所，我向同室的一位延安女干部讲起这些，她冷静地笑了：“你别同情他们。这些人，到现在这一步，有社会原因，也有他们个人原因，你不信，即便在北京，就是在延安，他们也混不好，他们老躺在北京人身份上睡觉哪成？心理永远不会平衡！人嘛，到哪说哪，北京人怎么了？当初全国人都在受难，北京人就不该受？现在，全国人都搞改革，你北京人就该吃大锅饭？当然，王春英例外。”

几天以后，在北京，我和王春英通了电话，她告诉我，听说她的那个电视片在北京得奖了。她还说，前几天，一个同学回来，在她家吃的包饺子，可热闹了。我说：“别说了，真让我嫉妒。”她笑：“谁让你时间那么紧？”

在电话里，王春英说话又是陕北腔儿了。

□ 摘自《中国知青情恋报告》

~~~~~

#### 【童年旧事】

#### 洪荒年代记事

• 力 刀 •

#### ◇ 小裤腿，火箭鞋及大背头

六六年革命小将们发传单，剪小裤腿，剃火箭鞋（也有称导弹鞋），把大背头剪成太极球般的阴阳头，干得天翻地覆慨而慷那会儿，我等只是忙着弹弹子，粘知了，赌烟纸片等。革命？那是大人们的事。虽也去看批斗会，更多时候是盯着卖冰糕的桶缠着父母一会儿就要买一根，什么赤豆的、薄荷的、桔子的，3分钱一根各种尝遍，斗谁是不管的。至于抢传单是为了回来叠更多的纸盒子枪、纸箭和伙伴们打仗用。但真正能引起我等顽童兴趣的革命行动而且至今记忆犹新的，还真是现在人们“疑心”其真实性的事儿：最喜欢看小将们（不久街道居委会的普通革命群众也参与了）逮着“流氓阿飞”般人物修理一番。虽然刚进入性朦胧早期，男女界线分得很清，但对于“流氓阿飞”的性行为的真正含义是盲然无知的。只知穿小裤腿裤、导弹鞋及留大背头者皆为“流氓阿飞”，属应修理对象。每每遇见此类事必是冲上前从围观的大人们腿间钻到圈内第一排看个过瘾，回来与同伴们炫耀一番，如阿Q般“噤，好看！”

几次所见皆为放学后：正在大街上走着，忽见几个手持木棍铁管戴红袖章的人发一声喊围住一个修理对象扭住胳膊腿修整起来。对于“小”裤腿是有定量指标的：凡750ml酒瓶不能塞入者皆属该修理对象。只见一个汉子拿着大剪刀“吡啦”两下子沿裤缝裁开直至大腿中段，每侧两下。两刀加原来两道裤缝，这裤子肯定是全毁了，除非改成短裤夏天穿了。革命行动还是男女有别的：对于“女流氓阿飞”一般只剪到膝盖处即止，不再往上，以免一般群众雪亮的眼睛受到毒害犯“红眼病”。

所谓火箭鞋就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假华侨洪常青打入南霸天府上时所穿的那种行头。既是海外人穿的，必是“资、修”货，属当剃之列。剃者必是用快刀，但也有用五金铺行里卖的剪铁皮的大剪刀剪的——剪小裤腿是同样有效的。要命的是，剪时鞋尚是穿在脚上不容脱掉的。“咔嚓”一声，或剃或剪，导弹头和弹体就这么分离了。再“流氓”的汉子腿脚都直往后撤，口唇哆嗦脸色发白转发青，即便我等观者也不免下意识地缩一下脚趾头——这就是为何要鞋穿在脚上剃的道理，如同陪斩或假枪毙一样：太具有打击力了！当然经济打击也是一个方面，一个青工月薪不过买双这种鞋而已。

最让我等感到某种快意的当属剪大背头、蓬松头：只听“咔嚓，咔嚓”声响，剪刀推子过后，沿正中一半青亮的头皮暴露出来，另一面则象过夏的松鼠尾巴毛，稀稀拉拉参差不齐。对于这种惩罚的心理作用我等还没有体会，但深知其皮肉痛苦的厉害，这种剃头时可没有理发店那般伺候的，什么靠背椅啦，围巾啦。想想吧：下剪的主儿故意把衣领撑开，让剪下的头发楂都落入内衣与皮肉之间，那是何等厉害的慢性折磨？

那时最让我等发怵的事之一是老爷子带着去澡堂洗澡：搓背前非让下到烫水池里泡一会——好搓泥儿。再就是理发了：发楂进到脖子上的滋味太难受，坐在那儿左右扭动只恨时间过得慢。围巾围得再好，每次总是免不了掉些发楂在内衣里让人刺挠挠地难受好半天。何况这大把头发故意塞进去？待修理对象放生时，你看他们那个蔫巴样就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真正含义了。

如此几回，街面上“流氓阿飞”顿时消遁不见踪影。最后一次见到革命修理行动是一次流产的剃头行动：红袖章们围住一抱着孩子的书生模样的青年要修理他的中间分缝的背头发。这青年紧张地结结巴巴道：“师、师傅们，这发式可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发式啊！不信您老们看……”说着指住自己胸前佩戴的盗制毛主席纪念章。可不是，他老人家剃着大背头拿把油伞正朝安源走来呢。众人皆哑然。青年人拍哄着吓哭的孩子，另一手突然把头发一把揪下来了！亮出个疤痢头，叹气到：“我害过癞痢头，为遮盖才买了个假发套，店里也只有这种型号的了。师傅们看……”没说完，一也是疤痢头的壮年袖章，大概是个头儿，也不知对这青年人还是他的袖章们还是我等围观者吼了一声“傻愣啥，走吧！”众人悻悻散去。

我瞅着那抱孩子远去的青年人背影，背上一阵轻松。从那以后，再未见过修理的景了。

#### ◇ 学习班记事之一：小顾和小蔡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一发表，俺们和大人们连夜游行庆祝，那是很开心的事：放鞭炮敲锣打鼓闹一宿，第二天就不用上学了，沾知了、打弹弓仗、摸鱼捞虾、偷果园，小孩子家混日子自是有很多好办法。

这办学习班的主意大概是军队最早提出来的，得到老毛首肯并圣旨一下，全国到处就开办学习班了，而军队的比地方的自又是更上一层楼。随着学习班规模越来越大，自然要有足够大地方，于是以往的军队农场就成了学习班的好地方。大院里的孩子以前好以各自老爷子的几颗星几条杠来自豪并在同龄孩子中排座次，学习班开办后则立马成了以老爹进学习班与否及在里面蹲的时间长短来排座次。没进学习班的是天罡星，进了的是地煞星。

我的一位顾姓女同学父亲最早进了去，她人长得矮小黑丑，加上没有母亲照料（母亲情况不详），头发常长虱子，还得了癞痢头，因而成了班里众人最早的攻击目标，她带着小弟弟在大院里走，真如同过街小老鼠一样。与她划清界线，并参予欺负她的，就有我，虽然她也是班干部，学习特好，我是班长，直到我的老爹也进去为止。多年后整理旧物，在家父的一素材本里

看到，她父亲被斗死在学习班里，法医鉴定记录死时身長缩短近十公分，体重仅四十多公斤，有多处皮肤烧伤痕迹(电刑和火烧所至)，多处骨折尽失人形，而他生前却是身高一米八十，体重九十公斤以上魁伟的飞行大队长，是空军战斗英雄！

另一蔡姓漂亮女同学（也是个小班干部）的父亲虽没死在学习班里，可出来后没多久死于癌症，他肩胛部因癌肿溃烂一个大洞，在“学习班”里却仍要抗着一百斤的粮食麻包走那三十一四十度的粮囤木桥。曾有从那桥上摔下被麻包砸死人的事。她有个哥哥名叫金刚，几年前我在A C T中文网上聊天见有个“金冈”好写空军战史，就曾想此金冈或是彼金刚？

近二十年后的1988年，我到南京参加第九届全国外科年会就住在南空大院招待所，院后就是我度过五年半时光的母校小营小学，小学后面就是小顾家曾住过的院子，前面的院子则有小蔡家，辗转了许久，问了多人想打听她们的下落，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去屋在音信全无。

多年来心里总擱着一个疙瘩：她们后来怎么样了？活得可好？！

老天在上：小顾和小蔡妹妹可知当年那个同班混小子很惦记你们？很想亲口对你们说声：对不起？

#### ◇ 学习班记事之二：走在蚌埠大街上的将军们

在学习班里体罚拷打自不必说，最令人发指和难以承受的则是精神折磨——“革命”的心理战攻心战。其效力往往比体罚更能奏效。比如：给被害人家属放被害人受折磨后屈打成招的口供录音，一转身再给被害人放其家属对组织表示要划清界线的录音，这招很灵，曾使很多家庭破裂，当事人被逼疯甚至自杀。

另一种精神折磨是干校学习班最拿手得意而最让受害人心理崩溃的招术：去蚌埠市医院看病，由端着带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押解着，穿着一身洗得发黄发白的破军装，领章帽徽则全被扯掉，步态蹒跚地走过一条大街，而这些囚徒其中不少人当年就曾冲杀血战、跌爬滚打，也是这样押解国民党兵走过这地方——淮海战役（“国军”的话应叫徐蚌会战吧？）之地。那种对人格心理的摧残使很多老军人愤而拒绝再去医院看病，宁可病死在学习班房或干校地头也不愿受这污辱！这使得很多人或积劳成疾或病入膏肓，出来后或残或早逝。前文里小蔡之父即是一例。

家父的顶头上司文革开始时红过一段，后来也进了学习班，他家三个孩子以往是挺霸气的，尤其老大，是大院里“铁流兵团”首领之一，好穿一身将校呢军服，骑一三枪车呼啸挥舞着将军武装带，领着帮弟兄追打另一帮“钢铁兵团”的（老爷子先进学习班的）子弟。可待他老爹进班后，三人在学校一下成过街鼠辈，再抬不起头，老三比我只高一级，跟我倒还能玩得来，也没在俺面前霸道过——他摔跤败在了我手下。后来，他父亲遗臭万年，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杀在干校学习班——跳粪坑里死的。俺到今天都不明白：一人要自杀，而且跳粪坑寻死是要多大的外来打击逼使他走出这一步！？当然也不能100%否定是被扔下去的！前海军司令上将陶勇不就是被大铁钉穿脑扔到井里的，还被说是自杀？！

就是在这个农场，在没办成学习班干校时，我们时常去学农劳动，有一年，我曾因劳动表现出色（刨地瓜），在结束劳动回家前，带队的空司老将军郑重其事地当众奖给我一个当天刨出的农场亚军大地瓜，父母高兴，全大院去的小伙伴羡慕：那是个近十斤重、一个军用书包刚容下的大地瓜。回来供在老毛石膏像前舍不得吃。直到二周后才吃了。生吃，那汁水浓甜，此生难忘。

空司家属大院门口是汽车连营房，家里有进学习班干校的，就常往那跑看有无从干校回来的人，有无自己的亲人。小孩子家只是想念爸爸，哪知父母心中的苦痛？多年后整理旧书信，无意翻出父亲的素材记事本，封皮一行腥红的大字：血泪斑斑!!! 里面除个别具体事例很多都已变模糊了，可一位老将军的话至今记忆犹新：“那里面（指干校学习班）比国民党的集中营还难熬啊”！

我曾问父亲为何不把这些写出来？父亲说：“这些事能写吗？怎么写？话剧“在社会的档案里”比这些要算什么？还不是被禁演、被枪毙了”？！

可我记起“革命导师”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 寄自美国纽约 6 / 2 4 / 2 0 0 2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四）

• 周孜仁 •

（续上期）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是5月6日公布的。四月下旬，已经开始盛传被川大八二六（当然也包括西师八三一）捧红的刘结挺、张西挺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活动，即将正式成为四川省最高权力机关革筹组的组阁人，甚至一、二把手。对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砸派，这消息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时候，不知从北京什么地方已经传来了所谓“三十六条权经”的政治秘笈，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记得。如第一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又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又如：“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又如：“谣言重复三次就变成了真理”，还有什么“与其花十倍的力量去掌握一门技艺，不如花十分之一的力量去交一个精通这门技艺的朋友”；还有一条十分要命：“诱导对方犯错误”。作为少数派的砸派，显然想抓紧时间激化矛盾，刺激人多势众的八一五过于自信同时便过于脆弱的神经，诱导他们犯错误。4月27日，政法兵团心血来潮，公然开着队伍直接跑到八一五的腹地重庆大学示威挑衅，大骂八一五“右倾”、“叛徒”、发誓要“砸烂伪革联”。这一队区区人马，自然被重大学生轻而易举便赶出了大门：政法兵团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开重大，他们便径直开到市委大院静坐去了：强烈抗议伪革联挑动群众斗群众。1967年四、五月之交，革联会所在的市委大院，已经乱麻麻一团。政法兵团这次长达五天的静坐，把这种混乱推向了高潮。

严格意义上说，砸派这次静坐质量实在不高，因为当时我在报社上班，天天路过看见，他们的静坐显得太随意、甚至还又点游戏成份，毫无悲壮可言。说游戏成份，是因为户外太阳大了，大家就到办公楼的门厅里去吹电扇，躺沙发；天凉一些，又到地坝来坐着聊天、唱歌，喊喊口号。“战友”声援、慰问来了，大家彼此热闹热闹，口号便叫得更响些，而“声援”“慰问”者一走，办公楼前的大坝上就仍然稀稀拉拉坐些人员休闲。既然对方没有激烈行动，革联会也就不想理会，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整个过程只有八一五小股骚扰，其中，有六中32111者来贴过几条标语：“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好耍”、“电扇+沙发=静坐？”、“祝政法砸牌把地球坐穿”、“静坐只能触及屁股，不能触及灵魂”——我对这次静坐的全部印象，好像就这些。

问题是，这种长时间的不战不和终于让双方都觉得应该找台阶下了。于是突然传来消息，说砸派预谋，要在五月二日那天对革联会采取行动，准备冲击办公大楼了。时间是凌晨2时，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啸而起，数千学生于是紧急集合，稍事动员，便迅疾开赴城区，将市委大院里坐得迷迷糊糊的政法砸派突击合围，以几对一的悬殊力量将对方拖的拖，推的推，赶的赶，稀里哗啦便驱逐出境。事实上，警备司令部的军人早已等候待命，重大815刚把政法学生驱赶出门，他们便已出现在现场，以制止武斗为名将双方隔开，接着出动军车五辆将大街封锁起来。

几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情节，客观地说，815和警备司令部的行动配合得默契如此、严丝合缝，真正的预谋者显然是他们无疑。宣扬危机或者制造紧张空气往往可以凝聚军心、激励斗志：我记不起在“三十六计”里是否有这一诀？反正八一五总团的学生领袖们肯定是这样做的。而实实在在面临危机的砸派，当然不愿忍气吞声受此窝囊气，于是迅速在全市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对市委大院实行反包围。当时，重大815的主要人员已经得胜返校，留下守卫的军人太少，无法抵挡砸派如潮攻势。入夜，军人已多人受伤，眼看大院即将失陷，支革派组织的数倍于对方的兵力又及时赶来——这一次，砸派见好就收。他们显然不愿意进行一场显然会丢掉的战斗。扔下一地的汽水瓶、废纸、垃圾，他们主动撤了。

事情当然没有完，人的仇恨，和爱一样，一旦埋进心底，就会像种子埋进泥土，它要么它被遗忘、死亡、消解得了无痕迹；要不它就定然会顽强地破土而出，长得浓荫参天，长出比它自己大得多、多得多的累累果实。埋在砸派心里的仇恨，在1967年夏天的山城，催生了一片血雨腥风。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